

中西大学通识教育理念演进与 制度建设比较研究

金宏奎

(南京财经大学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自由教育是西方高等教育的基础,文理教育是现代意义上通识教育的直接源头。在西方,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涵盖了有教养的人、公民人格、服务社会、立足知识等核心价值。民国时期以蔡元培等为代表的“培养学生之完全人格,体智德美四育和谐”“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等观念是中国通识教育现代化的理论成果。通识教育理念与制度的互构形成的中国经验对未来大学通识教育,乃至大学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大学通识教育;理念演进;制度建设;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7)12-0048-06

通识教育作为现代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理念源于西方的自由教育,历经工业社会、现代化国家建构的历史,深受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内涵丰富且取向各异,不同国家、学校的通识教育理念差异巨大,与之相适应的通识教育制度共同构成了现代大学通识教育体系。就中国而言,西方通识教育理念的移植、制度的借鉴成就了通识教育的西方源流,而本土化的教育需求及传统教育理念的传承则是形塑中国通识教育面貌的重要元素。西方源流与中国现实是深入探究大学通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实背景。

1 西方大学通识教育理念演进与制度建设

“第一个将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与大学教育联系在一起的是美国博德因学院(Bowdoin College)的帕卡德(Packard)教授。”^[1]而西方人最早所提及的通识教育则是“Liberal Education”,相对应的中文译文包括文雅教育、博雅教育、自由教育。“自由教育包括两层涵义:其一是指对自由人进行的教育;其二是指有关自由知识的教育。”^[2]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自由教育是西方高等教育的基础,甚至作为今天西方大学教育结构的基本理念而存在。

20世纪50年代前,高等教育受实用主义、科学主义等思潮的影响,逐渐以培养契合现代化国家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为己任,专业教育、职业教育等取向使得现代大学教育窄化和功利化,对传统的大学价值及发展理念造成冲击。“以尊崇古典学术为核心的‘自由知识’教育转向以尊崇现代科学为核心的‘文理教育’(arts and sciences)。”^[2]这一转向造就了现代大学教育“文理教育+专业教育”的组合框架,而在这一结构中,文理学院作为西方大学发展的核心机构,承担着通识教育的重任,真正成为美国大学发展的主导。文理教育是现代意义上通识教育的直接源头,也是通识教育美国源流的精华所在。文理学院所传授的知识是关于物质世界和人类世界的理由、原理和根据的知识,是专业教育的理论基础,是技术教育、专业教育裹挟下的通识教育,其内涵、理念与自由教育大相径庭。

收稿日期:20170929

基金项目:南京财经大学教学改革项目(JGY1610,JGW1788);南京财经大学高教研究一般项目(GJ201628)

作者简介:金宏奎(1982-),男,甘肃庆阳人,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美国高等教育史上著名的《红书》(The Red Book)将通识教育定义为“学生在整个教育过程中,首先作为人类的一个成员和一个公民所接受的那部分教育”^[3]。这种通识教育赋予人们在生活中必备的各种知识、能力、思考、信念、修养等。哈佛、耶鲁、斯坦福等大学各具特色的通识教育理念成为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缩影。“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四种能力,有效思考的能力,清晰沟通的能力,做出明确判断的能力,辨别一般性价值的能力。”^[4]其追求的目标是培养“受过良好教育的男人和女人”,即培养“有教养的人”的通识教育观。“斯坦福大学旗帜鲜明的以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作为通识教育的目标,其核心理念是被称为 CIV 的‘文化、观念、价值’。”^[5]耶鲁大学的通识教育强调知识的持久性价值,推崇保持知识的连续性的教育理念。综上,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涵盖了有教养的人、公民人格、服务社会、立足知识等核心价值。

进入新世纪以来,大学通识教育逐渐成为一种教育理念,以此为基础构建契合新时代发展的高等教育格局成为当下西方高等教育工作者的共识,教育理念呈现多元化、综合化、个性化和实践化的特点。西方大学根据自身优势和发展需求,秉承通识教育理念,构建各自的大学通识教育格局。斯坦福大学始终将通识教育作为本科教育的重要内容,2013 年开始实施全新的通识教育方案,“为学生提供高质量、个性化的通识教育,重视学生的思维训练,培养学生写作、语言等方面的能力。”^[6]打破过于森严的学科界限,强化通识教育在大学教育中的位置是当下俄罗斯大学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利用自身优势,基于通识教育原则成立了自由艺术与科学学院,在课程、学习路径、教学方法设计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益尝试。”^[7]“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在 2013 年宣布实行以通识教育为核心的大规模本科教育改革。”^[8]东京大学继续保留教养学部,对本科培养机制进行改革。京都大学取消教养学部,大学主要负责提供系统性的通识教育课程,进一步重建和强化通识教育体系。哈佛大学于 2016 年颁布通识教育实施计划,首先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自由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即“使学生为公民生活做准备并且道德地参与这个不断流变的世界。”^[9]最新的通识教育计划以培养“世界公民”界定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对通识教育课程进行调整。

就制度建设而言,早期西方自由教育的理念主要是通过学园、学苑的设置实现的,且作为早期西方教育的主流存在的。后来伴随“文理教育”的盛行,经历从学苑向大学教育转变的过程。“在现代大学专业设置体系中,逐渐形成了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并存的结构。”^[10]选修制度的出现,则造成了两者的分化,催生了今天大学以主修制度和通识必修制度结构的大学课程体系。科系制的出现是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对立的制度根源,也成为今天掣肘大学通识教育成效的根本性制度困境。跨学科制度则再一次为两者的融合提供了制度机会,也奠定了我们今天探讨通识教育发展的背景性制度支撑。

在国家系统性教育制度的支撑下,西方大学通识教育理念得以广泛传播和认同。各大学在实践中形成的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成为西方大学通识教育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英国大学通识教育体现了自由教育的传统,倡导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发展。”^[11]日本的通识教育首先将一般性教育引入大学教育,推行一般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四年一贯制模式。“台湾的通识教育是建构专业基础的教育,是具有整合性与贯穿性的课程,确立了通识教育在大学中的核心地位。”^[12]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日本的大纲化改革废除了一般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区分,使得大学通识教育在制度上失去了支撑,学分遭到削减,出现了整体性的停滞。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日本综合性大学将“通识教育的目标升华为社会发展所需能力建构;内容边界延伸……关注教育的过程和互动……统筹全校通识教育的运营管理”^[13]等做法成为日本大学通识教育重回大学教育核心的重要举措。哈佛大学调整大学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进一步将通识教育理念落实到具体的教育行动中去。“课程内容多元化,秉承生活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按不同课程类型在大学一年级完成”^[14],同时兼顾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三大知识门类的分布。

2 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理念演进与制度建设

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理念的形成经历了对世界通识教育理念的借鉴及传承本土通识教育思想的发展

过程。黄俊杰认为,“儒家、道家与法家诸子的教育观中蕴含着通识教育的思想。”^[15]清末民初的现代大学通识教育已有发展。民国时期以蔡元培等为代表的“培养学生之完全人格,体智德美四育和谐”“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等观念是中国通识教育现代化的理论成果。1949年后,苏联教育模式的移植,使得通识教育的提法在中国高等教育界消失。

改革开放后,鉴于专业教育在大学人才培养中的弊端,通识教育再次得到国家、学者的重视。1989年,周远清、杨叔子等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的文化素质教育的理念。中国通识教育在大学教育中真正实施始于1995年。早期的大学通识教育理念包括两方面的进路:一是对西方通识教育理念以及我国传统教育理念的批判性借鉴。“大学教育应该重视通识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养成,是精神人格的组成内涵。”^[16]“大学通识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复合型人才,而复合型人才就是在接受较高水平专业训练的同时,也能在知识、能力与品德修养等方面获得全面培养与发展的人才。”^[17]人格陶冶是大学通识教育的重要理念,应该致力于培养一个完整的人格。二是素质教育框架下不断丰富通识教育的内涵。大学通识教育要与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专业教育应该与通识教育相结合。”^[18]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国家、学者开始致力于建构中国特色的通识教育理念。学者们对通识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及其在大学教育中的价值等展开探究。“通识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的基本宗旨实质上是相通的。通识教育可视为进行素质教育的一种方式。”^[19]“通识教育要进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中,是高校推动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20]“通识教育是现代大学本然价值回归的凭借。素质教育是通识教育的灵魂。”^[21]

近年来,在不同理念的指引下,建构中国通识教育的实践机制和策略成为通识教育理念演进的新趋势。将通识教育与现代大学制度、自由教育、大学治理等战略建构相结合,考察通识教育的价值、内涵,并进行反思、再认识。同时,就通识教育理念实践相关的策略展开探究。有学者认为:“通识教育可以分为高标准和低标准两重含义。高标准的通识教育概念以培养学术专家和大师为目标,低标准的通识教育培养学生的一般常识和价值观。”^[22]中国政法大学在通识教育改革的实践与探索中,跨学科、跨领域融合不同门类的课程,将中西文明融合为指向,引领全校通识教育教学设计,提升学生的责任和担当意识,打造“有灵魂的通识教育”^[23]体系。

就政策层面而言,从国家、地方、高校自上而下三个层级的推进素质教育的政策群成为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制度建设的大背景。一是国家层面,1995年7月,国家教委发布了《关于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的通知》,开启了素质教育制度建设的征程。1998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1999年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这些政策搭建了中国素质教育发展的整体性框架。二是省级层面,各省级教育部门在国家推进素质教育的框架中,制订适合本省实际的发展制度。如1998年,浙江省发布了《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通知》,确定在全省普通高校推广浙江大学、杭州大学的试点经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2005年,江苏省委出台了《中共江苏省委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率先实现基本教育现代化的决定》其第四部分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题,对实施素质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是高校层面,针对本校实际,形成可操作的制度规范。如河北大学《关于开展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建设年报工作的通知》、合肥学院《关于举办我校大学生素质教育讲坛的通知》等从制度构建、实施策略等方面具体规范大学通识教育的实践。

通识教育的概念被认为是西方产物,所以在中国官方的制度构建中少有提及,更多的倡导及制度实践体现在教育高校、学者通过实践形成的一些好的机制和做法,这成为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份额呈增加趋势,基本维持在1/3以上,课程内容由全校必修课和文化素质教育选修课组成,在课程设置上“照顾到学科间的联系,设置了跨学科的课程。与学校性质结合,体现学校特色”^[18]。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必修、限选和自由选修三种,教学形式还是以授课式教学为主,少部分以讲座和课堂讨论的方式进行。

国内一些高校在通识教育方面的实践探索值得其他高校借鉴和学习。复旦大学以“追求大学教育的本然价值”为目标,将通识教育理念融入到整个大学教育体系中,从课程改革、体制创新、招生录取方

式改革等几个方面构建“一个全面的策略,遵循教育规律和自身的实际条件,精心设计教与学的关系及其调整办法”^[24]。在课程改革中,复旦大学“将当时全校60多个专业划分为14个大类,实施‘通才教育,按类教学’,打通了同一大类专业的前期课程。目前,构建了综合教育、文理基础教育、专业教育三大课程板块,形成了以综合教育和文理基础教育为主要特色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24]。在体制创新方面,复旦大学在2005年成立了复旦学院,所有入学新生在这里共同学习一年,破除了通识教育融入学生培养管理体制之间的壁垒。还成立了“通识教育研究中心”,就全校性的通识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探讨并形成方案。自主选拔录取,注重学生全面素质发展是复旦大学在招生改革方面的重要经验。东南大学从自身学校特点出发,“通过设置新型实验项目、增加新型实践教学环节、创建新的教学模式、构建网络助学平台、创新保障机制等举措,构建了‘新生引导性实验实践课程’,全面实现因材施教的符合通识教育理念的教学探索。”^[25]在台湾地区,台湾大学等高校“确立通识教育在大学基础与核心教育中的地位,统筹课程体系、课程建设与经营管理,培养基于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跨领域整合能力的人才”^[26]。各高校以倡导通识精神为理念,以尊重和满足人的本质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围绕课程设置、教学改革、教学过程管理、重视学生发展评价等方面形成了诸多好的做法和机制,丰富了我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制度建设体系。

随着时代的变迁,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内涵也与时俱进,不断丰富,被赋予了诸多价值和意义,同时也与大学教育各个方面发生勾连,或融合、或竞争,共同形塑了现代大学教育的面貌。“通识教育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反映的却是一种世界性的高等教育理念与意图。”^[18]通识教育的发展是西方理念“本土化”和中国的“本土化创新”协调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终将以制度的形式建构和固化,制度则作为中国现代大学通识教育发展的环境体系存在。通识教育理念与制度的互构形成的中国经验对未来大学通识教育,乃至大学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3 启示与借鉴

3.1 大学通识教育是一种有灵魂的教育选择

近代意义上的大学通识教育实践,是为了规避专业教育极盛所造成的弊病而推行的。中西方通识教育目标均指向克服专业教育的弊端,让大学教育回归理想状态,以通识完善人,让大学教育回归本然价值,实现知识与人之间关系的正常化。当下通识教育的目标还包括调和大学教育理想与社会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克服知识工具化、人与知识关系异化的问题。具体而言,因历史渊源和社会现实的差异,中国大学的素质教育、人文教育概念过于宽泛,在实践中内容庞杂,目标不清楚,加之教育理念意识形态化,各大学在通识教育的实施中思维、理念趋同,少有个性、特色化的通识教育理念讨论及建构的成果。西方大学继承了通识教育自由、多元的因子,实现了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理念与社会环境的良好互动,通识教育理念逐步多元化、综合化。

与专业教育相比较,大学通识教育是一种有灵魂的教育选择。今天的大学倡行通识教育,实为经世致用、专业教育等观念深入人心,使得教育造就“健全之人”的初衷难以达成而为之。大学教育不仅是一种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获得和训练,更重要的是一种人性解放,“养成社会健全的分子”^[27]的过程。大学通识教育的实践是要训练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培养人格健全、视野开阔、胸怀宽广、素质全面的现代人。有灵魂的通识教育为人性的解放和自由提供空间,对教育之于人的期待更加全面和宽广,其教育的目标是满足人自我完善的需求,让高等教育更好地为人服务。有灵魂的通识教育不是把大学教育当作工具,为社会发展训练人、奴役人,而是让教育回归本位,为人类获得自由,实现自我升华服务。

3.2 制度的构建是大学通识教育理念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

一种教育理念的实现,离不开好的制度保障。这里所谓的制度,不仅包括国家的教育政策、行政法规等,还包括大学之间以及大学内部相互交往形成的同盟条款、协作机制以及大学内部的章程、条例、好的工作经验和做法。大学教育深嵌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体制,是系统性社会构建的重要参与者,也是社

会、区域文化传承的重要领域。在中西大学通识教育制度建设的实践中,从西方的学苑到文理教育的盛行,从中国的诸育并进到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包括各大学富有特色的通识教育制度实践的经验积累,都是大学通识教育理念不断完善的制度保障。因此,只有将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与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相结合,将不同的社会阶层及群落的文化需求作为大学通识教育实践的起点,充分考虑社会成员的教育需求及文化需求,以系统性的思维考察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同时将行之有效的制度构建起来,形成大学通识教育理念实践的保障机制,才能全面推行造就“健全之人”等通识教育目标。制度的构建还应该包括施教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互动机制,在反馈中修正、调整大学通识教育的推行策略,在满足受教育者需求的同时强化教育的理念和价值,全面构建大学通识教育改革发展体系。

3.3 教育理念与制度的互构:中国通识教育的发展之路

通识教育理念就是要以人为本,将人对教育、知识的需求满足放在第一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且将这一理念融入到当今大学教育的方方面面,以通识教育理念完善现有大学教育的缺失,构建一个全方位的战略是中国通识教育发展的基础。通识教育理念要融入到大学改革发展的具体措施中,从招生录取、师资配备、课程调整、教学过程管理、学生活动监测、效果评估等方面做出改革,将通识教育的勃兴作为专业教育勃兴的基础去抓,在一个整体的过程中实现大学教育的目的。教育制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仅是国家、社会诸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同时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但要有其创新、独特的一面,保持自我系统的独立性。制度要有一定的连续性,加强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大学、学生之间的沟通,增进与社会各方的联系与互动,增强制度的效力和认同,实现理念和制度的融合与良性发展。

纵观中西通识教育的实践,教育理念与制度建设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呈现动态发展的趋势。早前的通识教育专注于精神生活及学术研究,相应地以学园、学苑的形式以保障这一理念的实现。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实用科学和工科带动经济发展的势头明显,专业教育成为高等教育的主流。专业教育对大学精神及通识教育理念的侵蚀,使得人才培养及大学教育无法有效对接社会发展,由此形成的“专业教育+通识教育”的结构体系是通识教育理念与制度互构的结果。此后,高等教育在社会系统中的角色日益复杂,且作为主体的大学在教育目标设置及人才培养实践上的认知日益多元,使得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制度建设,尤其是富有特色的个性化经验成为“通识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开放式)”^[28]模式实现的重要保障。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与制度的互构,实质上是将互动与合作作为大学通识教育体系建构的重要方法,融合理念与制度之间的差异及对立,在互动中形成经验的、真实的,且符合发展实际需求的系统性结构,以实现理念与制度的整合,构建良性的大学通识教育运行体系。

同时,“制度是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复的行为模式,是一种规范性文化。”^[29]如果从这个意义出发,规范性的、约定俗成的制度与理念的互构将是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发展中的一对重要关系,也是通识教育理念得以贯彻的重要保障,这种保障不仅是规约性的,更是一种文化范式的构建。通识教育的价值追求与大学教育的理想形态相对接,作为一种大学教育发展的理念,实现理想的大学教育存在状态,是现代大学发展理念的代表性趋势,也是塑造以通识教育理念与现代大学治理相融合的大学发展之路的典型思维。大学文化样态的构建离不开无形的理念和有形的制度的互构与融合,更需要将有限的个体经验与无限的社会变迁结合起来。大学通识教育理念与制度的互构形成的大学文化范式是大学发展理念从差异走向认同,在多元化发展、协调化发展实践中的重要探索,也是对大学之道的有益尝试。

参考文献:

- [1] 张立鹏.当代中国大学通识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8.
- [2] 杨叔子.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之比较[J].高等教育研究,2007(6):1-7.
- [3] 王丽娟,姜伟宏.赫钦斯的通识教育理念述评[J].当代教育科学,2009(15):11-13.
- [4] 朱晓刚.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解析[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1):5-8.
- [5] 黄坤锦.大学通识教育的基本理念和课程规划[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7):26-37.
- [6] 刘学东,汪霞.斯坦福大学通识教育新思维[J].比较教育研究,2015(1):42-46.

- [7] 刘金花. 俄罗斯大学通识教育的探索与实践——基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经验的分析[J]. 比较教育研究, 2017(8): 25-31.
- [8] 陆一. 21世纪日本大学通识教育再出发: 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两种模式的比较[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5(1): 166-192.
- [9] 王欣. 世界公民: 重新定义受教育的人——解读哈佛大学《通识教育审查委员会最终报告》[J]. 当代教育科学, 2017(3): 68-72.
- [10] 季诚钧. 大学课程概论[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 [11] 易红郡. 英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及路径[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2(12): 89-95.
- [12] 董宇艳, 陈杨, 荣文婷. 台湾地区高校通识教育理念与模式[J]. 高校教育管理, 2012(9): 25-28.
- [13] 刘爽, 李曼丽. 日本大学通识教育变革(1991-2015): 进步抑或倒退[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6(1): 39-46.
- [14] 吴坚. 哈佛大学与复旦大学通识教育课程设置比较研究[J]. 高教探索, 2016(2): 28-33.
- [15] 庞海芍, 邹秀红. 中国高校通识教育: 回顾与展望[J]. 高校教育管理, 2016(1): 12-19.
- [16] 章开沅. 通识教育与人文精神[J]. 高等教育研究, 1995(2): 1-3.
- [17] 崔清田. 通识教育与逻辑[J]. 天津师大学报, 1994(4): 23-27.
- [18] 李曼丽. 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理念及制度的构建反思: 1995-2005[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6(7): 86-99.
- [19] 王义遒. 大学通识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6(7): 2-7.
- [20] 顾海良.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with 素质教育[J]. 中国高等教育, 2006(4): 1-4.
- [21] 张楚廷. 素质教育是通识教育的灵魂——兼论我国高校素质教育之走向[J]. 高等教育研究, 2008(7): 6-9.
- [22] 赵海峰, 罗跃军. 通识教育视野下的哲学教育——以黑龙江大学哲学精品课建设为例[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4(9): 150-152.
- [23] 俞学明. 以中西文明通论课程为统领 打造“有灵魂的通识教育”体系——中国政法大学通识课程改革的实践与探索[J]. 中国大学教学, 2017(3): 29-33.
- [24] 王生洪. 追求大学教育的本然价值——复旦大学通识教育的探索与实践[J]. 复旦教育论坛, 2006(5): 5-10.
- [25] 戴玉蓉, 熊宏齐, 张远明, 等. 贯彻通识教育理念 构建新生引导性实验实践课程[J]. 中国大学教学, 2012(2): 71-73.
- [26] 董宇艳, 陈杨, 荣文婷. 台湾地区高校通识教育理念与模式[J]. 高校教育管理, 2012(9): 25-28.
- [27] 晏阳初. 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 [28] 李立国. 工业4.0时代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6(1): 6-15.
- [29] 亨廷顿.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8.

(责任校对 王小飞)